

二十世紀名人紀實叢書

體壇爭雄人物

策 划 空 堂

主 编 康 捷 魏 兵 柳 霜

體壇
爭雄

太白

文艺出版社

二十世纪名人纪实丛书

策划 空堂

主编 康捷 魏兵 柳霜

体坛争雄人物

太白文艺出版社

(陕)新登字017号

二十世纪名人纪实丛书

体坛争雄人物

主编 康捷 魏兵 柳霜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汉中地区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125印张 2插页 270千字

1995年3月第1版 1995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

ISBN 7-80605-185-6/I·152

定价：11.9元

目 录

中国体育备忘录	张鲁雅(1)
第一个创造举重世界纪录的中国人	刘祁禄(34)
戚烈云创造了中国第一个游泳世界纪录	袁钟祥(44)
世界女子跳高冠军郑凤荣记事	王崇理(55)
三破蛙泳世界纪录的穆祥雄	袁钟祥(71)
冠军留下的遗书	袁钟祥(82)
李淑兰一箭夺冠	夏小友(96)
乒坛上的“智多星”——徐寅生	袁大任(102)
总理为倪志钦写成绩	王崇理(128)
珠穆朗玛峰顶上的女性	王廷郁(152)
举重史上的光辉一页	魏国栋(161)
足球名将容志行	于炼 凌波(172)
东方女剑客——栾菊杰	孟庆玉(188)
陈肖霞泪别跳台	孟庆玉(202)
“体操王子”李宁	刘晓利(220)
枪响——“零”的突破	冯贵家(230)
女排的金牌之战	何慧娴 李仁臣(241)

“比基尼”风波·····	黄济人(279)
叶乔波的速滑梦·····	胡世宗(305)
聂卫平其人·····	张挺 孙晓青(320)
谢军的马尼拉之战·····	王崇理 马年华(357)

中国体育备忘录

●张鲁雅

1928年——阿姆斯特丹
——第9届奥运会——中国
首次派出一名代表前往参观

记不清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史上有多少“第一”了。在公元1928年5月17日，在饰满鲜花的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刚刚举办的第9届奥运会，仍然有得是机会不断地推出新的“第一”。其中最惊人的，是首设女子田径比赛项目，直把对妇女怀有偏见的“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惹得大光其火，竟以不肯出席大会来表示他的观点：“妇女在奥运会的作用，仅在于将橄榄枝荣冠戴在胜利者的头上。”

如果说，这个“第一”是世界妇女走进奥运会的一个伟大起点的话，那么，还有一个小小的不见经传的“第一”，悄悄地

无声无息地却开创了整个中华民族参与奥林匹克运动的新纪元。

一位年青潇洒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前身）干事——宋如海，作为中国的第一位正式代表，被派往阿姆斯特丹参观奥运会。一种渴望与西方世界求同的心理，使这位喜欢穿长衫的体育界书生，穿上了西装。他淹没在那四年一度的犹如节日般的聚会里，没有谁能够想得到他是中国人。

然而，宋如海的胸中，一颗中国人的心，无时不在激烈地跳动着、撞击着，尽管他的脸上微笑依旧。也许是中国人大多不喜欢形于颜色，宋如海也不曾忘记这个传统，甚至无论怎样的酣战，都不能赢得他比微笑更多的表情。

他不肯动容，因为场上没有中国人！

中国人，虽然剪掉了那条愚昧的“猪尾巴”，却没有脱掉“东亚病夫”的帽子；

中国人，尽管在亚细亚东部的小范围内，有点体育方面的小名气，却不曾郑重其事地考虑过如何走进世界的大体坛；

中国人，像一个刚刚进城的“老土”，怯怯地望着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拿不定主意，找不到坐标，甚至不敢伸出手与洋人握一握，因为自己的胳膊没有人家的粗……

“强国须强种啊！”宋如海慨叹着这个中国体育界叫得很响的口号，眉头微蹙。他在琢磨着如何把奥林匹克运动会介绍给中国、激发出中国人参加这一世界运动的热情，“Olympic——奥林匹克”他咀嚼着，他有点担心很多中国人不理解这个洋名词，他的思路继续前推“Olympia”——奥林匹亚——我能比呀！”蓦地，一个巧妙的谐语出现在他的脑海中，他不禁得意地朗朗上口：“我能比呀，我能比呀！”

据说，饮料可口可乐的中文翻译被认为是音谐义赅的最佳选择，其实把“奥林匹克”翻译成“我能比呀”的天才，绝不逊于可口可乐。更何况，这期间所包含的苦心孤诣焉是可口可乐所能够比拟的？

1930年，由宋如海编著的《世界运动会丛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其书的副名就叫《我能比呀》。扉页上还印着如下之言：“按系古希腊运动会的名称，世界运动大会仍沿用之。我能比呀虽系译音，亦含有重大意义，盖所以示吾人均能参加比赛，但凡各事皆须要决心毅勇，便能与人竞争。”

毋庸解释，今天的人们很容易明白这几句话的意思，甚至比当时的人更理解它深层的含义。

“我能比呀”，是一声呐喊，是一股激情，是一腔热血，是千千万万渴望祖国富强、不甘落后于人的中华儿女，从压抑的心底发出的呻吟。

这呻吟，唤起了中国广大知识分子和城市民众的共鸣和支持，却无奈国力羸弱，民不聊生，缺吃少穿没有钱。我虽能比，可又怎么比呢？

好在中国体育界，抱定“体育救国”的宏旨，虽然在现实面前常常碰得头破血流，却仍能一次次在绝望中挣扎，一次次从打击下奋起，特别是当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在中国大好河山上后，“我能比呀”就是号角，就是力量，就是团结，就是向日本侵略者反击的宣言。

也许，那时候的中国人对奥林匹克运动的理解还很幼稚，甚至仅仅是抱着为民族争气的狭隘观念、悲壮地走进这个并不是战场的“战场”的。但是，谁又能指责那时候的中国人想得不对呢？

功过是非，自然有人评说。

记录在此，就是怕忘却。

备忘录一：400000000比1

1932年——洛杉矶——第10届奥运会

——中国首次派出一名运动员参加比赛

1932年7月30日，美国洛杉矶拉开了第10届奥运会的序幕。前导旗下，引来了一支中国体育代表队。不要指望有什么特别热烈的掌声和欢呼，过去那发黄的历史照片上，只留给我们一些观众冷漠的后脑勺。据当时的报刊说，当中国体育代表队走进会场时，受到人们的“赞许”和“注目”。

这是一支临时拼凑起来的队伍，共6人。排成三列，一一四制，倒也整齐、鲜明。走在最前面的，是唯一的一名运动员刘长春，他手执青天白日旗，气宇轩昂。2米之后相随的，是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总干事沈嗣良，神态庄严。1.5米之后走成一横排的是4位，其中一位是教练兼翻译宋君复；其余三位是在美国临时物色的，倒是都和中国体育有关，为刘雪松、申国权和托平。

只是三人中有两位不是中国人，申国权为朝鲜侨民，托平为美国人。这位托平是上海西侨青年会的体育主任，此时恰在洛杉矶休假。当他听说中国运动员来了，马上跑来问长问短，力尽东道主之谊。为了表示感谢，沈嗣良特别请他加入了中国体育代表团。后来，托平自豪地说，他从事体育工作多年，曾代表过土耳其参加第8届奥运会，这次又代表中国参加第10届奥

运会，他觉得非常荣幸。

大约这就是美国人与中国人的不同之处吧？特别是在民族意识上，中国人看得重一些。所以，总觉得这样一支含有33.33%外国人的、首次参加奥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队，颇有点喜剧效果。只是让人笑不出，酸酸的倒有点悲。

更可悲的是，中国体育代表队，不是顺顺当当、随随便便地出现在奥运会场上的，而是集中全民族的锦囊妙计，冲破种种的艰难险阻，方能在奥运会上亮相的。用一个最准确最能说明问题的字眼，就是被“逼”来的。

“逼”上奥运

1932年的中国历史，太沉重太憋气了。在这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中国体育界准备参加第10届奥运会的热望，又被泼上了冷水。

当时主管这项工作的国民党教育部，以国难当头，时间仓促，准备不足为理由，断然拒绝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要求，正式宣布不派遣运动员参加奥运会，态度之强硬，连一点回旋的余地都没有。

其实，“国难当头”也好，“准备不足”也好，都是堂而皇之的借口。蒋介石纠集63万兵力对红军开始第四次军事“大围剿”，岂应是国难当头之所为？堂堂大国，早知道在洛杉矶举办奥运会，根本无意参加，还说什么“准备不足”！说穿了，一句话，就是舍不得拿出钱来。而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这个自筹资金的民众团体，又如何拿得出大笔经费派遣运动员呢？只好派出自己的总干事沈嗣良前往洛杉矶参观。

又是参观，宋如海的“我能比呀”算是白喊了。

抵触的情绪，笼罩着整个体育界。著名体育记者阮蔚村在天津《体育周报》上很有代表性地叹息：“忆自上届中国派宋如海出席后，当时全国的体育界，都抱了绝大的希望，以为第10届大会，中国一定有选拔选手出席的希望。荏苒四载，以前我们的一腔热血，现在又是绝望了。”

绝望中，一则惊人的消息使事态急转直下。

据悉，日本帝国主义把持下的伪“满洲国”，将派遣东北运动员刘长春和于希渭，代表伪“满洲国”参加奥运会，其外交部长谢介石已向驻哈尔滨的美国领事提出派遣选手2人参加奥运会的要求。

如同烈火烹油，消息传到北平、天津后，立即引起教育界青年学生和进步力量的极大愤怒，体育界的怒火更是到了白炽的程度，人们纷纷要求政府表态。但那些平时喜欢说点“有健全之体魄，始有健全之精神；合健全之国民，始成健全之民族”一类漂亮话的政府要人们，此时全都闭上了嘴巴，缄默不语。

大家明白，这个一心只想打内战的政府已是不可指望了，唯有自己想办法粉碎日伪之阴谋、扬我中华之正气。于是，体育界的爱国人士马上行动起来，先派人和流亡在北平的刘长春取得联系。刘长春是东北大学体育科的学生，当时全国百米纪录的保持者。他闻讯后，当即在《体育周报》上发表严正声明：“良心尚在，热血尚流，岂能叛国，做人牛马?!”接着，体育界又派人辗转与正在大连教小学于希渭进行联系，请他进关。但此时的于希渭已被日伪监视，无法脱身，只好称病在家，拒绝出席奥运会。这样，日伪妄图利用的两个对象均不能为其所用了。

更有人，想起“将计就计”的古老兵法，建议何不让刘、于二位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的比赛，这样日伪的阴谋岂不是不攻自破吗？对此，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连连称善，其会长张伯苓和董事长王正廷亦极赞成，只是所需费用尚需筹措。为难之际，东北大学体育系主任郝更生临危请命，承下重担。

待到一切准备停当，发现此时已过了奥运会规定的报名截止日期——6月18日。真是好事多磨，心慌慌的体育协进会立即急电洛杉矶请求通融。6月26日晨，奥运会复电准许。那时候，奥运会的各种参赛规定尚不是特别严格，这才给了中国人一个机会。

至此，事情并没有结束，于希渭尚在大连，无法通知。东北大学体育科学生傅宝瑞自告奋勇，潜回大连寻找于希渭，约其由大连直接赴上海和刘长春汇合以便同行，但从此便消息全无，让同伴们心中久久地忐忑着。另外，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又考虑到刘长春不懂英文，一人放洋不便，便派东北大学体育教授宋君复与其同往。并计划于7月8日由上海乘邮轮赴美。

就这样，为了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企图挟世界承认伪“满洲国”、摆脱其孤立处境的阴谋，在爱国人士的殚精竭力下，中国首次参加奥运会这样的大事，便匆匆、草草地决定了。这也是形势所迫，逼上梁山啊。

东 北 硬 汉

在这次参加奥运会的前前后后中，关系最大、出力最多的是东北人。如果说，是日寇侵华逼得中华民族不得不弯起手指，叩开奥林匹克的大门，那么这强有力的手指，则是由东北硬汉

们组成。

大家知道，钱，一直是能不能参加奥运会的关键。中国再穷，也不至于拿不出这几个路费钱，只是国民党政府不肯把钱用在体育上。那么，郝更生到底是从谁的手中筹措到这笔经费的呢？这一直是个谜。直到后来才知道，是爱国将领张学良慷慨解囊，资助了1600美元。不知为什么，当时的报刊杂志均没有披露，只是说郝更生受到前天津市长张学铭和东北大学秘书长宁恩承的帮助，这也许是张学良不肯炫耀自己罢了。

提起张学良，人们都熟知这位被周总理誉为“千古功臣”的抗日伟绩，但很多人也许并不知道他对中国体育、特别是东北体育的贡献。

旧中国的体育本不发达，东北的体育更有“关东白帽子”之诨号。1928年，自张学良主持东北军政权并兼东北大学校长后，便从“强国必先强种”的愿望出发，以东北大学为中心，以同泽中学为重点，在东北学校中展开了轰轰烈烈的体育运动。

据不完全统计，从1928年到1931年“9·18”事变之前，由张学良主持并资助的运动会达10余次之多。有的运动会规模之大、水平之高为当时全国之首。1929年5月，第14届华北运动会在沈阳举行，8省330余所学校的1200余名运动员参加了竞技，其盛况为历来华北运动会所未有。张学良为名誉会长，并身着短袖衫和短裤，兴致勃勃地参加了跳远比赛。就在这次运动会上，刘长春创造了百米10秒8、200米22秒2、400米52秒4的全国纪录。

同年10月，张学良特邀日本和德国一流选手到沈阳，发起了中、日、德田径运动会，使中国运动员得与世界强手一决雌雄。为此，张学良拿出其父遗产30万元，在北陵修建了一座在

当时堪称现代化的体育场(即现在沈阳体育学院体育场)。不料,在离运动会还有三天的时候,发现场地土质过于松软,不符合比赛标准。怎么办?到底是握着兵权的少帅,立即调来两个营的兵力,连夜赶修,直到运动会开幕的当天早晨,才修整好。高兴得张学良禁不住在那还散发着黄土香味的跑道上跑了一圈。

运动会后,张学良以每月 800 两白银、专用小轿车一辆、马两匹的优厚待遇,留下了当时 5000 米世界纪录保持者、德国田径队队长步起在东北大学任教。也许是中国运动员和德国教练有缘,在施拉普那“要为中国培养出世界一流球星”的 63 年前,步起已经在为中国培养优秀的田径运动员了。

1930 年,旧中国第 4 届全国运动会在杭州举行。开幕式上,东北运动队的百余名选手个个头戴白帽子,精神抖擞地走进场内。马上,观众们的目光全被吸引了,有知情者,还高喊着“东北白帽子”大声助兴。比赛时,这些“白帽子”们可不含糊,特别是刘长春、头戴白帽,连获百米、200 米、400 米冠军,得意非凡。有趣的是,每个获奖者,都重复着同一个动作,把自己头上那顶白帽子摘下来,和着观众的掌声和欢呼声摇啊,拼命地摇。不要以为这是一个不谋而合的动作,其实,这是张学良事先交待好的,用以表示那顶不光彩的“东北白帽子”从此摘下。

“9·18”事变后,整个东北陷入日本帝国主义的魔爪。东北大学在张学良的支持下,迅速将学生疏散回家,并指示他们各自前往北平报到复课。刘长春也于 9 月 21 日回到大连的家中。不料第二天一大清早,就被伪警察传去问话。刘长春明白,必须赶快脱身为妙,便向家人说明情况。妻子一听赶紧心急火燎地跑回娘家,借了 70 元钱,含着眼泪将刘长春送到船上。

刘长春走了，可苦了家中的老人。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工人，怕惹事便举家搬到60多里以外的旅顺口。谁知日本人竟能两次找上门来，要家人写信给刘长春，要他回大连，还说要给他“满洲国”教育部门和体育部门最大的官做，逼得刘老父亲只好再一次仓皇地将家搬到河口村避祸。

年迈的父亲、贤惠的妻子、贫穷的家庭，何尝不让刘长春牵肠挂肚啊，然而，为了祖国，为了东三省，他在日本侵略者的威胁利诱下，始终没有低下中国人的头，也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辽宁省选手。

那时候，东北大学体育队的运动服是上白下黑，取意东北的象征：长白山和黑龙江。每当这支黑白分明的队伍进入运动场时，便会赢得人们的阵阵掌声。东北沦陷后，白衣黑裤成了东北运动队的标志，每逢国内有重大比赛，刘长春和流亡在各地的东北选手，都会克服重重困难，穿上这身衣服。人们每每看到他们，便不禁想起侵略者铁蹄下的白山黑水，顿时群情激愤，洒泪唏嘘。

1931年7月1日，东北大学体育科在北平举行了第一期、也是最后一期毕业典礼。迫于条件困难，体育科已经停办，诸教授将各奔东西，诸学生也要另觅活路。此时此刻，这些辗转入关历经艰辛方完成学业的莘莘学子们百感交集，校长张学良也很激动，他压住心头的诸多感慨，庄严地宣布由刘长春、于希渭为运动员，宋君复为教练员，代表中国出席第10届奥运会的决定。用这个伟大的创举，来为东北大学体育科画上一个悲壮的句号，多少安慰了这些国破家亡、流离失所的东北硬汉们。

单刀赴会

当时，有一幅漫画，画的是刘长春身着盔甲，手提大刀，脚踏独舟，英姿勃勃前往洛杉矶，名曰“单刀赴会”。取意《三国演义》中大将关羽只带一口大刀和少数随从赴东吴宴会的故事，以赞扬刘长春身负民族的重托，只身前往奥运会的勇气。

刘长春看到这幅画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觉得自己比关羽幸运，虽然是只身参赛，然而背后有着祖国四万万同胞的支持和期望。几天来，每到一处都受到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都得到同胞们的热忱鼓舞：“老刘，你是幸运的，但你的使命也是最大的。一个人向前奔跑，四万万人民跟着你逐走呢！”

7月2日，刘长春与宋君复乘上平浦201次快车，先到南京，再到上海，然后乘威尔逊号船赴美。送行的还有郝更生和其夫人高梓。郝更生一向善于辞令，好出风头，这次奥运会之事真给他以展示才能的绝好机会，所到之处，必有他的讲演。在上海记者招待会上，只见他整衣而起，口似悬河，极其愤慨地报告说：“鄙人自沈变避平后，即悲痛异常，不料日人竟又藉此世界运动会之机会，代伪‘满洲国’在国际间搬弄是非，而有派遣刘长春、于希渭两选手出席大会之宣传。在此种恶劣情形之下，而我政府有不派代表出席世界运动会之宣言，此不啻予日方一绝好之机会，故我国在此种形势之下，非派选手赴美不可，盖否则即不足以攻破仇人之奸计也。”一番话说得众人无不凄凉慨然。接着，郝更生又汇报了筹备经过，及自己如何千方百计，更使大家齐叹“郝君之功，厥不在小”。转尔，郝更生在庄严的语调之中，又吐出无限希望于刘、宋，“表现我大国民之

精神于欧美各国之前，”最后一声“行矣刘君，千万珍重！”把朴实憨厚的刘长春感动得几乎落泪。他说不出郝更生那么动听的语言，唯有绷着国字脸，咬着牙齿暗暗下着决心：“我要拼命地跑！拼命地跑！”

7月8日，刘长春和宋君复要出发了，黄浦江畔新关码头，人头济济，热闹非凡，数千名热情欢送的群众把夏日的空气增加了几多的热度。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董事长王正廷亲自前来送行。这位王正廷。早在1922年就成为当时中国唯一的国际奥委会委员，同时他还当过北洋军阀政府的外交部长和国民党政府的外交部长。“9·18”事变后，愤怒的南京、上海爱国学生捣毁了国民党外交部，并殴打了王正廷。王正廷逃到一艘炮艇上后被送到上海住院疗养，并于9月30日宣布辞职。事隔半年，王正廷的心情当然不会好，但他毕竟是个场面上的大人物，只见他一身丝绸长衫，一顶细草礼帽，一架金丝眼镜，一副儒雅风度，丝毫没有显露出政治上的不顺心。他手执中华民国国旗和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会旗各一面，用静穆庄严的口吻，对刘长春训言道：“我国此次派君参加世界运动会，为开国以来第一次，实含有无穷之意义，予今以至诚之心，代表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授旗与君，愿君用其奋斗精神，发扬于洛杉矶市之奥林匹克运动场中，使中华民国之国旗，飘舞于世界各国之前，是乃无上之光荣也。”随后，将两旗一并给了刘长春。

刘长春接过旗后作简单答辞：“我此次出席世界运动会，系受全国同胞之嘱托，我深知责任重大，我当尽我本能，在大会中努力奋斗，以付四万万同胞之期望。”此番肺腑之言一落音，周围环立的人们，立即报以如雷的掌声和欢呼声，就连那些不知其故的码头工人和小贩，也随声附合，好不热闹。